

京华文丛

Российский мираж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м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ю профессора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

——林精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自选集

林精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京华文丛

Российский мираж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м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ю профессора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

——林精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自选集

林精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林精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自选集 / 林精华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1110-874-3

I. ①现… II. ①林…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俄罗斯—文集
IV. ①I206-53②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3360 号

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

——林精华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自选集

林精华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25.5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81110-874-3

责任编辑: 鲍家全 姜 萍
责任印制: 赵明炎

装帧设计: 孟献辉
责任校对: 刘 红 胡 颖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目 录

俄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问题

民族性、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

——关于俄罗斯文明史问题的研究	1
-----------------------	---

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

——关于西方斯拉夫学研究导论	38
----------------------	----

“东方”或“西方”：俄国人审视自我的方法论	69
-----------------------------	----

俄国比较文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与俄罗斯民族认同	88
-----------------------------	----

普希金与拜伦：二百年来俄国知识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103
-------------------------------	-----

中俄文学关系问题

赞同抑或反对：“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	119
--------------------------	-----

写实主义潮流在现代中国如何可能

——关于俄国文化对现代中国文学影响问题的研究	141
------------------------------	-----

俄国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艰难旅行	162
----------------------	-----

现代中国何以从热衷于俄国文学转向苏俄文学	186
----------------------------	-----

文学理论的迁徙：俄国文论与中国建构的俄苏文论	212
------------------------------	-----

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学史的认知

——兼论苏俄文学史观对中国的影响	228
------------------------	-----

Research on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and

Evolutionism	252
--------------------	-----

中俄文化关系问题

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	262
俄国马克思主义转口输入中国:苏俄革命的影响·····	288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国际视野之建构:以《新青年》为观察点·····	306
俄国东正教正面价值何以在中国失落·····	329
苏俄文化之于20世纪中国何以如此有魅力·····	357
误读的意义与陷阱:苏俄文化之于中国的诸种后果·····	378
后记·····	403

俄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问题

民族性、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

——关于俄罗斯文明史问题的研究

俄国著名诗人丘特且夫(1803~1873)有诗曰:“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用公尺无法衡量它:/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对他只能信仰。”此论道出了俄罗斯文明的复杂性。的确,俄国的起始——基辅罗斯曾是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东正教文明的“卫星文明”,而后又成为西方文明的“卫星文明”,但其成就却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东正教文明,并且正是在这个文明影响下,俄国才使自己的文化越出先前的未开化阶段。^[1]然而,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的俄国,却始终动荡不定,即这些发展并没有给俄国带来的并非全部是好运。由此,俄国知识界开始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关于俄罗斯问题之争,事情正如当代著名学者伊利亚·伊林所声称的,“俄国一直在辨识自己诸多独特传统中不可理喻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方面是不断变化的传统”。^[2]然而,即便如此,俄罗斯文明仍是疑云重重,许许多多的问题依旧难以言说清楚,哪怕有很多重要的史实已经被澄清,但是对俄国历史问题变迁的解释仍不能让人信服,诸如俄罗斯发展之路与人类整体发展之路关系如何?俄罗斯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是否存在一种独立的俄罗斯文明?等等,在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中心和莫斯科社会与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高级研讨班“俄罗斯向何处去(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

第六次全俄研讨会上(2000),巴宾科教授做了题为《俄罗斯是属于欧洲国家吗?》的报告,而且报告声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种而复杂的。^[3]

是哪些因素导致俄罗斯变得如此复杂?这些因素又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俄罗斯?

斯拉夫民族性:俄罗斯文明的初始形态与身份标志

从地域和种族起源而言,俄国主体民族罗斯(Русь)—俄罗斯(Русский)属于东斯拉夫民族(他们生活于基辅和诺夫哥罗德、黑海以北和波罗的海以西之间的地区),同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接壤,其文明却不能归属于天主教或新教的欧洲文明,因为经典的欧洲文化起源于欧洲南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北方日耳曼文化,并经由基督教(1054年分裂罗马公教和东方正教之前的基督教)而融合一体。对此,著名学者史华兹断言,“俄国文化是否属于西方文化的部分是一个疑问,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进化是独立的”。^[4]法国著名的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持这样的看法,即在彼得大帝亲政之前俄国与欧洲是相隔绝的,不能被纳入“欧罗巴的欧洲”范围。^[5]

对构成俄罗斯主体的斯拉夫民族的确认是很复杂的。在发生学上,俄罗斯并没有优越性,其文化不如乌克兰那样久远(基辅罗斯是俄国起源),也劣于波罗的海民族(在古罗斯本土还是处于鞑靼人统治时,波罗的海地区已卷入汉萨同盟,资本主义文明几乎与西方同步),甚至无法与高加索地区的古典文明化过程相媲美(他们在奴隶制时期就已经创造出发达的文化,而罗斯是直接从部落跨入封建状态的),因而这些被强行纳入俄国的民族始终不忘对自己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在以后征服和同化其他种族的过程中,不断有其他姓氏的族群加入讲俄语的行列,但这些比例越来越高的异族人却不断保持着本民族信仰,俄罗斯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过程并非民族融合过程,如斯拉夫文化始终没能化解境内的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姑且不论就现代性而言,与拉丁文明或日耳曼文明相比,斯拉夫文明显示出更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斯拉夫文明天生发育迟缓,斯拉夫文化始终没有被提升为罗斯—俄罗斯境内公共的民族精神。

而且,“在基督教引入之前,罗斯(Русь)是没有高级文化的”。公元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之前,欧洲已有发达的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而俄罗斯重要

文献《罗斯法典》的问世比西方类似典籍要晚好几个世纪。神学思想家弗罗洛夫斯基在《俄罗斯神学之路》中声称,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有太多的疑惑和不可理喻之处,因为古罗斯文化是没立文字的文化。^[6]2000年7月,在诺夫哥诺德考古发掘了《诺夫哥诺德圣诗》,俄罗斯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主席瓦·亚林院士考证说,该书问世不晚于1010年,是俄国最早的手抄本,东斯拉夫文明最古老的书籍。^[7]而此时的拉丁文明与日耳曼文明已相当成熟。东斯拉夫民族地处与世隔绝的僻静之处,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像拉丁文明和日耳曼文化那样对周边地区产生大影响。这类自然基因,恰好决定了斯拉夫文明在起源上有别于欧洲文明(当然更不属于西欧文明),而且以后的发展虽然与欧洲关系不断密切,但始终没被欧洲同化。而“东斯拉夫信仰是俄罗斯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前提条件、出发点”,^[8]这就使斯拉夫文化的构成、历史地位和未来意义等问题成为俄国最为关注的话题,历代政治家和知识精英都试图通过重建斯拉夫文明,来构筑一个统辖全俄的精神,无论此举困难有多大。

早期斯拉夫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逐渐形成了适宜于本土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农业文明,由此使得俄国并非天然地形成了开放性、扩张性、面向海洋的商业社会,而是导致“俄罗斯人以热爱劳动,准确地说,以热爱农业劳动、以农民那出色农业经验为特色。农业劳动是神圣的。正是俄罗斯人的农业和宗教被强化得无以复加”。^[9]这种情形决定了俄国后来能接受带有东方性的拜占庭文化,还能与阿尔泰—蒙古文化融合,使农奴庄园制度的产生成为可能,进而使得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乃至俄罗斯帝国所推行的重农主义具有绵延不断的生命力,即使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违背重农主义的传统,如大批苏联主流作家担忧现代化会颠覆农业文明及相应的社会道德观念。与之相应的是,形成了压制商业贸易的传统,本土居民被限制参与商业贸易活动,在国家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也不主张开放,甚至在商业最为繁荣的17世纪,这种传统也未能改观。可见,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生成,与其说是与面向西方的窗户——彼得堡相关,不如说是与作为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莫斯科、诺夫哥诺德和普斯科夫等城市更加密切;^[10]相应的,俄罗斯民族性也并非根源于国家,而是本于人民、理想化了的古代农民公社、被分裂教派和彼得改革所排斥的大众宗教。^[11]

特别是,这种一开始就有别于拉丁文明和日耳曼文化的斯拉夫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在后来的制度化过程中,孕育了后来俄国民众顽固固守土地的观

念,并进而形成独特的村社制度,尤其是1861年改革,使得农村社会的基层管理单位的功能进一步强化(农民的问题不完全是由庄园主负责,而是转归村社负责,包括经济、司法、文教、宗教、社会保障等)。这样一来,经由村社,农民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国家也能对农民负责——给村民提供全面保护的家园,家庭能对其成员负责——村社按照道义原则维持着伦理关系。由此,进一步完善了村社制度,根据平均主义原则实现追求公正(包括人均分配财产、扶植穷人而限制富人和强者)、直接的基层民主形式(公开讨论村社中所有重大问题、全体村民以表决方式通过决议,但是没有一定的议事规则和法定程序),追求在同一个村社中实行绝对平等和集体主义原则(村社集体利益高于村民个体要求,村民平均地使用村社资源,反对任何超众的个人观点、要求和愿望),强烈反对私有制及其相关的一切现象、要求村社土地公有制和政社合一制度。而这种制度的民间实践结果,“往往不是确保各种意见得以发表时在质量上的可靠性,而是取决于数量、凭借集体意愿来下判断”,^[12]并且因俄国广大乡村生活方式长期的惰性,因而对个性化行为和外来文化都会表示强烈反对,也会因此影响了现代化运动的成效:1861年改革不是通过建立私有制,直接把土地交给农民,而是转归村社所有,并且不能随便自由流通,必须经由村社大会同意之后方可转让。因而改革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唤起俄国农民自我解放的热情,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同样,1905~1911年斯托雷平改革,尝试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拥有自己的份地”,这原本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但村社制度有顽强的生命力——期间俄国村社数目减少有限,据苏联学者统计,到1916年初仅近250万农户退出村社、拥有私有份地近1600万俄亩,占农户总数的26.1%、占村社土地的13.8%。^[13]而且,这种把村社集体主义宗法制转变为个体农业私有制的改革,是一种悖论性的政治冒险,只是通过行政动员手段,在法律意义上赋予农民自由退出村社的权利,没有充分考虑俄国农民不是西方国家的农民,天生缺乏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传统、愿望,也没有给农民提供实现这些自我解放的物质条件、制度性资源、精神力量,甚至动用与“自由”相悖的手段去强制性推行这种自由,使改革变成了对不愿意从村社土地所有制束缚下解放的农民的打击,或者说,可以解放的农民反而反抗这种解放,诸如绝大多数农民自发站出来护社,不仅自己不退出村社,还要求制止为数不多的农民退出村社(退社农民大多是比较富裕而能干的农民)。虽然改革在艰难历程中取得了不小成

就,如改革使俄国不仅首次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而且1911~1913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小麦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5%、大麦占34%、黑麦占50%,农业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为本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的资源。然而,就是在这种进步中,斯托雷平本人1911年遭枪杀,并且就是在这种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导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而且苏维埃制度建立伊始就实行计划经济,甚至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这类情形直接影响到20世纪俄国社会进程,在俄国改革很见成效的20世纪初(到1913年,俄国许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却发生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十月革命并建立了苏维埃制度,这与村社制度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种事实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识,如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1917年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自由思想》杂志1992年第5期)中声称,“村社制度这一古老传统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而且这是1917年政治文化的基础”,苏维埃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实现村社民主理想的国家尝试,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宛如俄国传统村社在部队的延续、复活,当时的口号就是“土地归人民、权力归苏维埃、打倒私有制”,而且所有决策是按临时民主表决方式,而不是按法定程序决定的。^[14]可以说,苏联集体化运动及其所建立的农庄制度,既是以村社传统为基础的,又是村社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合法延续和变体形式。^[15]何止是历史如此?同样,新俄罗斯改革10多年来困难重重,在很多俄国人看来,其原因不在于俄国没有遵从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社会发展的秩序化、经济建设的法制化等),而在于改革破坏了传统的集体意识、民族国家利益观念和社会完整性理想,破坏了传统价值观,也破坏了俄国现代化规律。^[16]这就意味着,斯拉夫文明的初始形态,注定俄罗斯很难形成西方的法制社会(包括法治理念和法制国家的建立)。

当然,这种村社制度所培育的一套观念,也是构成俄罗斯文明的基础之一,包括强调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在观念表述上非理性化/情绪化等。当然,这些特点,也构成俄罗斯自然法理的基础,如10世纪以后俄罗斯虽然接受了包括《农业法》在内的一系列拜占庭文化,但《罗斯法典》却显示出浓厚的习惯法和亲情伦理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由村社延伸出来的特点,在从古罗斯到帝国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结构演变过程中,始终维护这种惯例的专制制

度,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是怎样的无害于人,但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着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虽然并不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在公社上面”,“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17]也正因为如此,随着18世纪以来追求社会物质进步的现代化运动进程,这种依恋斯拉夫共同体的特性,却在外来压力下掩盖了其专制制度的实质,反而随之被提升为“祖国”、“家园”、“民族”、公民意识等。面对这种矛盾,这个村社制度成为知识界争论的焦点,即它是俄国发展的障碍,还是俄国避免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弊病的基础,斯拉夫派人士还视之为俄国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侵袭的重要资源,如科舍列夫在《论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1858)中动情地说道,“在欧洲,只有少数人才会富有,大多数人一贫如洗,因而在西方形成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诉求,尽管是完全自由、合乎逻辑、不可避免的,却必然会日益威胁着社会稳定……在俄国,感谢上帝,情况全然不同,我们不用担心西方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具有占有土地的村社,它保护绝大多数人,使之不至于无家可归、沦为赤贫,它保障了国家的安定”;伊·阿克萨科夫(1823~1886)在1880年普希金铜像揭幕典礼仪式上发表演讲《论普希金》称,“俄罗斯精神在俄国人身上几乎是由他生活所在的村社和集体制度所培育出来的,而这种制度很少促进主体性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我同样认为,我们幅员辽阔、规模超过五千万人的民族联盟和兄弟感情的广度,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对精神的某些广度和理解的多面性产生促进作用。我们比任何人更容易做到客观一些。此外,与西方毫不相干的俄国人,处于比欧洲更有利的地位,因为可以从旁观者角度去观察它,可以更自由而全面地去评判它”。同时,它也成为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根据所在,经济学家丹尼尔逊在《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1893)中声言,尽管资本主义改革使得村社没能保护好村民,还使之面临着灭亡的威胁,但是“村社的农业,是未来的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那种物质生产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使科学的农业和现代的大工业,同村社衔接起来,同时把村社变成能够成为组织大工业,和把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改造成为社会形式的合适程度”,^[18]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是主张通过村社制度来阻止资本主义对俄国的伤害,民粹主义思想家沃龙佐夫用古典经济学方法

证明村社制度避免俄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民意党的《工人党员纲领》更是宣称,“国家制度应该建立在所有村社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上”,村社制度成为俄国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俄国文化史上的主流人士,诸如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弗洛连斯基等都试图维护这种传统,苏联主流文学特别关注社会主义集体化如何可能和不可能、苏联社会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意义,甚至俄国后现代主义也成长于俄罗斯那独特的农民意识并且沿着这条路线发展。^[19]即使经过苏联 70 年集体主义教训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残酷训练,这套观念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变革,普京在 2000 年到来之际所发表的电视讲话《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0 日)中就声称,“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与支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掉这种习惯……有这种习惯的人还大有人在……应当在社会政策中首先考虑到这一点”。^[20]这并非危言耸听,今天的俄国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 1980 年代以来对资本主义的义理性争论,无论国民总收入下降得多么严重或国民经济状况改善得多么迟缓,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结构的工作做得仍旧不充分,难怪彼得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Л. 米亚斯尼科娃在《新经济和后现代召唤》(《自由思想—21 世纪》2001 年第 4 期)中断言,电子化、信息化、贸易国际化、高新技术化等成为新世纪之交“新经济”(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的基本特征,它们孕育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国家—市场—商业”,但促成这类特征或特性的“宗教改革”(реформация)和“自由个性”(свободный индивидум)在俄罗斯未曾出现过,我们一直保留着村社的集体/团队模式。^[21]

斯拉夫本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俄罗斯人找到了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根据,“在古老的族裔联系和传统、东斯拉夫人种族、自古以来的语言共同性等基础上,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意识形态等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在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开始形成了。罗斯人意识到他们是具有同一的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气质的人”,^[22]而且正是这种斯拉夫民族身份认同预设着俄国有自己的民族根基,同时构筑了俄罗斯文明的泛斯拉夫主义基础,把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冲突简化为族群内部矛盾:1830 年 11 月波兰发动反对俄国殖民统治的起义,俄罗斯大军兵临

华沙城下,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而普希金对此却写下如此诗句,“别管吧,这是斯拉夫人自己的争端,/古老的、内部的争端,早已注定是/悬而不决的问题。用不着你们来插手……斯拉夫的溪流应该泻入俄罗斯的大海……你们无法懂得家庭仇怨,/你们根本不懂其中底蕴;/克里姆林宫和布拉格不会理你们”(《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不久又创作了具有同样民族主义诉求的诗篇《鲍罗金诺周年纪念》(鲍罗金诺战役是俄国战胜拿破仑的关键性战役,1831年8月26日俄国军队占领了华沙,普希金听到这个消息写下了这首诗)。[23]而斯拉夫派理论家伊·阿克萨科夫在1880年普希金铜像揭幕典礼仪式上发表演讲《论普希金》却盛赞此举,“他多么敏锐地反映自己那个时代一切真正伟大的俄罗斯事件,多么热烈地关切俄国的荣誉、名声和外表的尊严;他以多么愤怒的诗篇回击‘毁谤俄罗斯的人’!这些人把整个欧洲纠集在一起,进行一次新的反对俄国的十字军东征。普希金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俄罗斯人,一个富有历史感的人”。另一方面给俄国人提供了审视世界的民族化视点,英国社会学家T.沙宁认为,俄罗斯是第一个对西欧经验之于人类的普遍意义或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民族国家,[24]艾恺先生考证出俄国斯拉夫主义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概念表示非我族类、定义本土文化的对立面,[25]也正因为这种传统存在使当代俄罗斯发现自己与美国的巨大差别达13项之多。[26]进而,脱离斯拉夫文明的西欧主义者常常遭到批评,普希金就认为试图在俄国实践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拉吉舍夫身上,反映出他那个时代法国哲学的全貌:伏尔泰的怀疑论、卢梭的博爱观……但所有这些观点在他那里都已改变原样,很不协调,就如同在哈哈镜里变得畸形那样……其活动目的何在?其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其本人未必能回答”。[27]由此可见,这种斯拉夫文明支撑了长期处在边缘化状态的俄国人,刺激了偶尔成为主流的苏联。

同样,斯拉夫民族性在现代化运动中被提升为抵御西化的重要力量,从而又成长为系统化的民族精神——斯拉夫主义。俄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伴随着反现代化潜流,而且反对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我们知道,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半个多世纪便产生了效应,也引发俄国人的西化趋向。对此,著名史学家和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1766~1826)于1802年在《欧洲通报》上发表文章《论热爱祖国和民族自豪感》,主张俄罗斯作家要坚决从崇拜欧洲权威状态中解放出来,要特别注意祖国文化的源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以为智慧是其他民族的智慧、声望是其他民族的声望:没有我们的夸奖

或吹捧,法兰西、英格兰的作家也能活下去;但俄罗斯作家特别需要俄罗斯的关注”,并在文章结尾提出斯拉夫主义起源方面的问题,认为“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开始是模仿他人的,但应该逐渐地自立起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现在我们已经那么多丰富的生活知识和趣味,过去我们就能生存下去,现在怎么要去巴黎或伦敦生活呢?……毫无疑问,谁不自我尊敬,别人是不会尊敬他的……俄罗斯应该知道自己的价值”。^[28]这样的想法,逐渐演变为1830年代之后斯拉夫主义潮流的思想基础,如斯拉夫派重要理论家伊·阿克萨科夫“为卡拉姆津的爱国主义情感而激动不已”,声言“确信出自其口的每一个词汇都是神圣的(sacred)。我的俄罗斯意识和敌视外国所有东西的思想都在自觉的增强,我的民族自豪感逐渐变成非常严重的排外主义(exclusiveness),这些都源自他的斯拉夫主义”。^[29]吊诡的是,无论斯拉夫精神对俄国知识界和民众多么有召唤力,但1812年战争之后,从法国凯旋的官兵们目睹了西欧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主制度,反而唤起了他们要改革本土的愿望,导致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1855年对土耳其战争的失利,迫使俄国政府必须更强力地推行现代化,出现1861年的改革;1905年对日本作战再度失利,政府被迫推行斯托雷平改革……而改革潮流及其促进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的变化,却坚定了俄国下层知识分子和草根阶层对斯拉夫主义的信仰,反西化的思想和行动绵延不断,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登陆的重要本土资源。1917年切尔诺夫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马克思主义与斯拉夫民族》,许多人赞同其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斯拉夫文明;1924年苏联公布了1881年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寄给民粹主义者查苏里奇的信,即“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0]这种有限度地肯定农村公社(村社)对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积极意义,更激发了苏联反西方情绪,坚定了它反资本主义的决心。

正因为斯拉夫文化在俄罗斯文明中占有如此重要位置,因而成了俄国民族精神建立的重要依据,斯拉夫民族的身份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基因,使之有可能独立发展自己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体系,

甚至连科学发展也自成一体。仅就科学而言,“俄罗斯和苏联科学,在职能成长方式上,与西欧和美洲就不一样。诸如 19 世纪俄国大多数生物学家能热情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却为何要摒弃其‘生存竞争’? 俄国的数学与天文学有很强大的传统,为什么实验科学却很弱? 为什么苏联物理学家长达 30 年之久拒绝使用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互补性概念? 苏联科学家在地质学板块构造的研究中很落后,为什么磁流体动力学研究却居于领先地位? 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对发展宇宙演化的‘暴涨理论’是热情的先导,何以又要批判‘大爆炸’理论? 哪些因素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原子能发电站和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此外,在俄国和苏联科学中还有因独裁专制以及充满意识形态苦难的历史造成的很多矛盾,诸如 1917 年革命前后会有那么多科学家陷入政治困境? 李森科主义是一种生物学说,它否定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推崇的近代遗传学成就,何以在苏联能长达几十年的占据统治地位? ……又有多少人知道‘基因库’一词源自俄语、人口遗传学的先驱们在 1920 年代都在俄国工作、土壤学的基本词汇出自俄文? ……与苏联科学机构的庞大规模相比,苏联科技成就又是令人失望的,诸如有些领域研究人员数以万计,却赶不上该领域专家少得多的国家的成果水平;苏联在计算机方面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后来却大为落后了;在很长时间段中,苏联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是不少国家模仿的榜样,却灾难性地滑坡了,这在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统计数字恶化上能显示出来……这些弱点是有其组织的、政治的与社会的根源的,苏联科学从来就不是靠同行评议和研究资助组织起来的,而靠的是对整个研究单位的大宗拨款”。^[31]而且,俄国非常重视对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思想史做出民族性解释,诸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为研究科学史而创办专门研究所和大学专门系科的国家:1921 年科学院建立了知识历史委员会,其研究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1932 年这个团体改为苏联科学院科学和技术历史研究所,尽管它是在革命后 4 年才成立的,最初支持它的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些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和史学家,其中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地球化学家、后来成为科学史研究奠基人的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Вл. Вернадский)。苏联时代独立发展高科技证明俄国科学发展是独立一体的,甚至也是有理论根据的:作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著名学者 Н. 卡列耶夫(1850~1931)1884 年 11 月在华沙发表的重要演讲《论俄国科学精神》中指出,“只有俄国科学具有最大的冷静和视野极大开阔的特点”,并解释说“这不是把幻觉当成真实的那种盲目爱国主

义,我把幻想与现实区分开来,我谈的与其说是从前和现在的俄国科学,不如说是有关它的未来发展”。事实上,这种强调科学研究的社会性目的和族群特色的情形由来已久,诸如在中世纪,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把大量的古希腊文献翻译成教会斯拉夫文字,却几乎没有一种古希腊的科学著作,对当时拜占庭的科学也少有兴趣的,^[32]到了18世纪后期随着科学院制度的确立、大学的兴起,俄国更强调科学发展的民族性诉求。而且,俄国自18世纪以来的确常出现经济不发达,但自然科学技术甚至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却得到超常发展的现象,直到今天俄国在强调重新建构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思想活动中主张要发展俄罗斯式科学的民族理念,诸如独特的科学管理模式、发展科学的民族性目的、甚至具体学科发展上也自成一体。^[33]既然在“科学”这个无国界领域,俄国也能创造出民族性来,那么其他方面更是如此了,诸如很多人文学科都试图用普遍文化历史的观点证明,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以后被培育方面来说,都不能认为俄罗斯文明是欧洲的组成部分——它面临的可能性或者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一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单元,或者丧失所有的文化历史意义。^[34]

同样原因,也形成了深刻影响俄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俄罗斯审美特征——大自然意象或意识或背景在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由对种族仪式和意识之钟情而生发出痴迷于象征的审美、对斯拉夫民族神话和习俗的认同而积淀成独特的民族心理、力图维持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而生发出与世界的差异、把追求感情的纯正和人际关系的纯洁当做叙事的基本规则等,进而导致俄国审美方式与西方差异巨大、与东方和穆斯林地区悬殊,19世纪末学院派代表 A. 阿法纳西耶夫的著作《斯拉夫人对大自然的审美观》、苏联学者 B. A. 雷巴科夫的《古罗斯文化史研究札记》、Л. 利哈乔夫的《古俄罗斯文学诗学》和《10~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时代与风格》、当代学者 B. B. 贝奇科夫的《俄罗斯中世纪美学(10~17世纪)》等详尽地描述了俄罗斯这种斯拉夫民族审美特性问题。正是这些为后来文学艺术不断追求民族性诉求提供了基础,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创作中强调西方文化的衰落和斯拉夫文化的青春活力,^[35]苏联杰出学者利哈乔夫院士在俄国的声望得力于在对古俄罗斯文学、俄国文学和近代俄国文化等研究中不断强调斯拉夫民族性价值。^[36]这种情形至今不变,如当代著名作家达吉扬娜·托尔斯泰雅在《女性的生活》(1990)中声言,“在俄国文化中,感情被赋予了几乎全是正面价值,因此这样的文化特征自然有别于西方的新教、启蒙主义。一个人表达感情愈丰富、愈好、愈诚挚,那么他

也就愈‘坦诚’。当俄国人们谈及灵/精神时,其所指是发展成熟的感情潜文化。你不必解释灵魂何谓,任何一个俄国人都能在感觉的广度和深度上详细解释这个主体。在潜文化层次上,女性似乎更强有力:这就是,她们有更丰富的感受,而所表达的更为坦诚、展示自身感情更为清晰,事实上,她们也就更是‘俄国人’。俄国文学不是知性的(intellectual),而是感性的(emotional)。在俄国,那些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理智,而是曾经突然拥有了理智。至少是试图理性化的人要被宣称成一个危险的怪人”。^[37]

正因为斯拉夫民族性占有如此重要位置,因而成了俄国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基因,使之有可能独立发展自己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和文化科学体系;文化起源与发展都显示俄罗斯文明不是欧洲的组成部分——它面临的可能性,或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一道形成独立的文化单元,或丧失自身的文化历史个性;同样原因,形成了早期罗斯审美特征——自然界成为理解人文现象的重要参数、由对种族仪式之钟情而生发出痴迷于象征、由对斯拉夫民俗的认同而积淀成独特的民族心理、由维持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而生发出与世界的差异等,并由此导致此后的俄国审美方式无论俄国多么西化,但与西方审美相比有巨大差异,与东方和穆斯林地区相比也很悬殊;这也就成为俄国文学艺术不断追求民族性的基础,诸如大部分作家都强调西方文化衰落和俄罗斯斯拉夫文化的青春活力。

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影响： 从初始状态到自觉改造的俄罗斯文明

罗斯于988年6月经由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但接受的是东正教而不是天主教。这是俄国自觉改观自己文明的构成和拓宽文明疆域的一次关键性事件,“拜占庭给俄罗斯带去了5件礼物:宗教、法律、对世界的看法、艺术和文字”,^[38]还有弥赛亚信念,即罗斯/俄罗斯从拜占庭那儿获得了其高级文化,即使苏维埃政权长期推行无神论政策也未泯灭其居民的东正教信念。俄罗斯文明与拜占庭的关系如此重要,因而在俄罗斯文明变迁过程中一直得到特别重视。

古罗斯/俄罗斯从拜占庭接受东方基督教的原因是很复杂的。330年君